

美国对华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 内生逻辑及战略效应

□ 储永正 宋德星

〔提 要〕随着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和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的崛起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一大威胁。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历经霸权护持警戒点、触发点、紧张点和关键点。特别是进入紧张点和关键点后，美国将现状设想为中国受益而自身受损的“损失域”，不仅引发其越发强烈的霸权焦虑，而且催生其通过风险寻求来实现霸权护持的非理性战略行为。这种行为的内生能源自美国霸权固有的逻辑、敌意螺旋的反复作用，以及风险寻求与“护栏”管理的内在矛盾。为遏阻中国崛起，美国对华采取自损式极限“竞赢”、选择性修正主义胁迫、阵营化盟伴网络围堵、代理人式消耗战等战略手段。对此，中国须直面其凶险，又知晓其限度，据此综合施策，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关键词〕美国对华政策、霸权护持、前景理论、风险寻求、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储永正，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宋德星，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5) 1 期 0072-22

随着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和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中国的崛起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一大威胁。自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高调宣布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定性为首要的系统性战略竞争对手，对华

进行全方位打压，不断制造冲突议题，扩展冲突领域。美国的这种霸凌行径既有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也有某种非理性冒险冲动。对战略理性问题，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研究十分充分，而对非理性冒险行为的探讨则多停留在案例层面。如何将美对华决策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统合起来给予学理上的解读，有待进一步深化。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霸权会经历成长、成熟和衰落的过程，但霸权国从不会甘心霸权地位的丧失。于是，维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努力“将这种权力距离始终保持为一个霸权国认为是安全的常数”^[1] 之内的霸权护持战略成为其必然选择。既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学理阐释丰富和促进了权力转移进程、霸权护持、霸权战争等方面的研究，但对霸权护持阶段风险寻求政策取向及其内在机理的探讨较少，只零星散见于相关案例研究。为了探究行为体战略决策中的风险寻求问题，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引入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前景理论由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9年首次提出，^[2] 重点阐释影响行为选择的非理性心理因素，为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做出突出贡献，进而推动行为经济学学科的创立。冷战结束以来，前景理论获得国际关系学界关注，被引入相关问题研究。已有众多研究指出，决策者在损失框定情势下具有风险寻求的政策取向。^[3]

尽管前景理论有关风险寻求政策取向问题的研究对国际关系诸多问题具

[1]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 D. Kahneman,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 1979.

[3] Mark L. Haas,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2, 2001, pp.241-270; Victor D. Cha, "Hawk Engagement and Preventive Defen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Vol.27, No.1, 2002, pp.40-78; A. S. Levi and G. Whyte, "A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Reference Dependence of Crucial Group Decisions under Risk,"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1997, pp.792-813; Tudor One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0, No.1, 2014, pp.125-152.

有较强適切性和解释力，但极少被用于解释预防性战争、多边联盟等霸权护持的手段，且主要是案例性质的研究，聚焦于解释国际事件中的决策行为。^[1]关于风险寻求政策取向内生机理的研究成果则很少见。本文结合认知心理学和前景理论，试图以“威胁感知—损失框定—风险寻求”的分析框架揭示美国霸权护持中风险寻求的内在作用机理、外在行为表现及其正反战略效应，剖析其战略制定中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及危险性。某种意义上，风险寻求的理论分析框架不仅能较好解释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政府对华霸权护持战略“敌对性”和“危险性”的一面，而且能就美国对华未来战略走向这一重大问题进行宏观意义上的战略预判，这对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稳定对美关系无疑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一、霸权护持中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理论建构

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霸权国时刻警觉崛起国权力增长带来的地位威胁，并对感知到的这类威胁进行威胁等级意义上的战略心理预判。如果判定这种威胁对自身霸权地位足以造成损失或已经造成损失，且损失还会继续，就会产生前景理论所强调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即认定当前状态是自身无法容忍的“损失域”。由此催生的政策取向是风险寻求，霸权国将通过全方位遏制、极限施压乃至制造危机来削弱对手，维护自身霸权地位。

（一）霸权国威胁认知的二维逻辑

关于威胁认知，认知心理学认为环境变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警觉和紧张。引起紧张的不仅是外部事件，而且取决于内在认知。^[2]换言之，认知是威胁

[1] Jack S. Levy,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he Reference Dependence of Crucial Group Decisions under Risk: Japan’s 1941 Decision for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6, 1999, pp.792-813; Mark L. Hass, “Prospect Theor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2, 2001, pp.241-270;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2] 白学军主编：《心理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页。

生效的关键机制。据此，有学者给出威胁认知的评估公式，即“威胁认知=被评估的能力×被评估的意图”。^[1]实际上，这里“被评估的能力”和“被评估的意图”就是进入决策者知觉范围并被加工的“能力”与“意图”，与真实情况不一定完全吻合。关于前者，决策者可能高估或低估对手的能力，或错判相关趋势，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和误解。^[2]至于后者，作为一种未来指向的意向性行动，则被认为与决策者和国际环境之间的互动紧密相关。^[3]从认知心理学出发，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一国对他国真实意图的不完全了解。正是意图的不确定性，往往促使决策者做出“最坏的打算”。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任何霸权都会经历兴起、成熟、衰落的过程，历史也充分证明不可能存在所谓“永久霸权”。尽管如此，对霸权国来说，攀上霸权顶峰后不愿因衰落而沦为二等强国，也是必然逻辑。因此，它会时刻对实力仅次于自己、有可能超越并取代自己的一个或多个次等强国保持足够的战略警觉。

那么，霸权国如何以及何时认知并判定这种威胁？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霸权国会因新兴国家的崛起而强化乃至提升威胁认知。^[4]但崛起是一个过程，杰维斯并没有准确给出威胁认知的相对时间点和赖以产生的认知机制。还有学者分析 19—20 世纪几个主要霸权国的权力变化周期发现，霸权国在连接其上升、成熟、衰落每个阶段的“关键点”（critical inflection），会因内外因素刺激产生强烈的威胁认知。^[5]这一定程度上揭示

[1] J. David Singer, "Threat Perception and the Armament Tension Dilemm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 No.1, 1958, pp.93-94.

[2]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6.

[3] Charles L. Glaser, *Ra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Logic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8.

[4] Robert Jervis, "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3, 2006, pp.13-14.

[5] Charles F. Doran and Wes Parsons, "War and the Cycle of Relative Pow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4, No.4, 1980, pp.947-965.

了威胁认知与关键点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对自身未来有良好预期的个体往往具有较低的威胁认知，因为他们更加自信；但自我预期相对悲观的个体，其威胁认知通常较高，因为他们容易缺乏安全感，对外界的不利变化尤其敏感。^[1]

根据前景理论中的框架效应，决策者会将达到或高于预期的结果视为收益框架或称“收益域”，将低于预期的结果视为损失框架或称“损失域”。^[2]可见，框架效应的前提是参照点的确立。结合上述观点，本文将被霸权国认知到的外在（崛起国）威胁与其在关键时段的心理预期参照点结合起来，来考察霸权国的霸权护持行为特质，强调“关键点”不仅关乎威胁认知，而且与前景理论所述霸权国对“损失域”的框定紧密相关。也就是说，霸权国认知的威胁与其心理预期参照点，即损失程度大小正相关，由此形成警戒点、触发点、紧张点、关键点四个战略心理参照点，对应由低到高的威胁认知强度。威胁认知强度的不同，直接影响霸权国的政策取向，当霸权国把某种模态视为不可容忍的损失状态时，其在战略心理上必然会将其直接框定为“损失域”，进而采取一种高强度的对抗性政策。

（二）霸权国框定损失的心理参照点

从前述框架效应可知，人们不是通过评估特定选项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净资产，而是通过比较选择的结果与心理参照点，来确定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结果。参照点通常是一个人已经习惯的现状，可能受文化规范、个人抱负水平、社会比较、当前需求状态、未来预期或过去历史等不同因素的影响。^[3]收益和损失就是根据与现状不尽相同的期望（expectation）或愿望水平

[1] Morris Rosenberg,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转引自庞琴：《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第78页。

[2]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Rational Choice and Framing of Decision,”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Vol.59, No.4, 1986, p.S275.

[3]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40; Rose McDermott, James H. Fowler and Oleg Smirnov, “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Prospect Theory Preferenc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0, No.2, 2008, p.336.

(aspiration)，也即心理参照点进行编码的。^[1]

尽管前景理论本身没有对现状的变化方向如何影响参照点的评估作出理论阐释，但根据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参照点会倾向于聚焦到新的适应点，以符合新的现状。不过，由于时间滞后问题，在适应之前，旧的现状仍然是参照点。^[2]故不同行为者对参照点的确立很可能是不同的，这在国际关系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3]

那么，霸权国如何确定自身的心理参照点？本文认为，霸权国大致有五个心理参照点：警戒点、触发点、紧张点、关键点和适应点。这些心理参照点往往被霸权国简单折射到某项足以反映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权力对比变化的重要领域，如一战前夕英国关于德国发展战列舰的霸权焦虑，二战后美国对于苏联发展战略核力量的战略关切，而冷战后大国间 GDP 比率的变化日益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本文即选取这一指标衡量霸权国心理参照点的变迁。

当崛起国 GDP 达到霸权国的 30%、40%、60% 和 70% 时，后者心理将分别进入警戒点、触发点、紧张点和关键点。在警戒点上，霸权国潜在的威胁认知被触发，催生其对崛起国的战略关注，并启动一定程度的预防性霸权护持行动。触发点是霸权地位的预警线，将引起霸权国低烈度的霸权护持行为，也即对崛起国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打压。在紧张点和关键点上，霸权国和崛起国关系进入历史性转折时期，霸权国将有高度不安全感，根据框架效应，将不惜冒险采取一切措施遏制和打压崛起国，而这种高烈度霸权护持的最高形式就是霸权战争。

根据霸权护持烈度差异，高烈度霸权护持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崛起国

[1] D. Kahneman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p.286;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41.

[2] Rose McDermott, *Risk-Tak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ospect The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41-42.

[3] Jack S. Levy, "Ap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to Political Science," *Synthese*, Vol.135, No.2, 2003, p.227.

GDP 达到霸权国的 60% 时，将进入高烈度霸权护持 I 阶段。此时，由于霸权焦虑急剧上升，霸权国的霸权护持手段频出但章法混乱，护持行动凶狠危险但效果有限。崛起国 GDP 达到霸权国的 70% 时，将进入高烈度霸权护持 II 阶段。经过 I 阶段的霸权护持，霸权国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并实施更为凶狠、更具针对性也更加危险的霸权护持战略，霸权国与崛起国的角力更加白热化。当崛起国 GDP 达到霸权国 100% 左右时，霸权国已无力遏制崛起国。按照前景理论，远离心理参照点，也就是崛起国 GDP 达到或超过霸权国的水平后，霸权国的威胁认知就会大为降低。同时，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现状适应效应，经过长期竞争博弈，此际霸权国已经接受崛起国崛起的事实。心理上的适应，加上实力对比不占绝对优势，将导致霸权国放弃霸权护持，转而与崛起国进行协调和合作，甚至将霸权“和平禅让”（如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从而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

（三）霸权国风险寻求取向的决策逻辑

外交决策在很多时候都是面向未来，而非仅仅着眼于当前的“现状”。一国即便目前享有客观上有利的权力地位，心理上仍会担心未来的相对衰落。故相对于收益，决策者对损失更加敏感：将本国框定为收益（处于“收益域”）时，其决策就会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将本国框定为损失（处于“损失域”）时，其决策就会表现出风险寻求取向。^[1] 依据杰维斯的研究，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损失的事实往往比损失的大小更重要，为此他们倾向于采取相对危险的行为，以避免或弥补哪怕是很小的损失，或是从现状中退缩；对于一个认为自己与对手处于零和关系的国家来说，这种趋势更明显。^[2]

可见，在领导人的计算中，权力、国际地位或声誉的预期损失比预期收

[1] Barbara Vis and Dicuwertje Kuijpers, “Prospect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Underexposed Issues, Advancements, and Ways Forwar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39, No.4, 2018, pp.576-577.

[2]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70, quoted in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2, p.287.

益更加重要。换言之，当领导人认为自己面临与预期水平相当的损失时，其决策更容易着眼于最坏的情况，并专注于避免损失。^[1] 与实现同等规模的收益相比，领导人更可能为了避免损失而承担外交政策变化导致的固有风险。故对于霸权国来说，一旦损失被框定，其认知指导下的政策行为就会自然倾向于风险寻求，并把这种风险寻求视为战略理性。

（四）风险寻求的内在效应：威胁认知螺旋与危机强化机制

根据前述理论阐释，由于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不断强化，并将现状和未来框定为自己的“损失域”，霸权国倾向于采取极具风险性的霸权护持行动。这种风险性决策和行动首先必须得到国内足够的政治支持。为此，霸权国政治精英会不断鼓吹崛起国的威胁，各政党为赢得或保有执政权，也会以此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各政党相互比拼“谁更对敌强硬”。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将导致政治圈内的威胁认知螺旋，本文称之为第一重威胁认知螺旋。同时，政治圈内的威胁认知，经过大众传媒向普通民众传播，一般民众在政治人物的不断鼓吹、媒体的不断渲染下，也会形成和强化威胁认知。^[2] 民众的威胁认知被激化、情绪被点燃，就会形成强大的“民意”，反过来对政府、各政党形成压力，从而强化政治圈的威胁认知共识，这是第二重威胁认知螺旋。

在前述两重威胁认知螺旋的作用下，为了因应国内政治压力，霸权国必然致力于通过追加风险、强化战略打压来迫使崛起国屈服或削弱崛起国实力。在这种战略心理作用下，崛起国的政策因应即便没有挑战霸权国的意图，也会被霸权国解读为“挑战者”，作为其不断加大霸权护持行为烈度的所谓“合法”理由。至此，霸权逻辑因错误的战略认知而不断强化，“想象中的敌意”开始主导霸权国的决策，理性决策机制逐渐运转失灵，结果必然是霸权国在与崛起国的互动中进一步推升威胁认知。这是威胁认知螺旋的第三重含义。

[1] Jeffrey W. Taliaferro, "Power Politics and the Balance of Risk: Hypotheses on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2, 2004, p.201.

[2]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拟态环境”理论认为，公众往往依赖大众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来指导其在真实世界的认知和行为。参见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Free Press, 1922。转引自张明新、游雯：《美国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一项实证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8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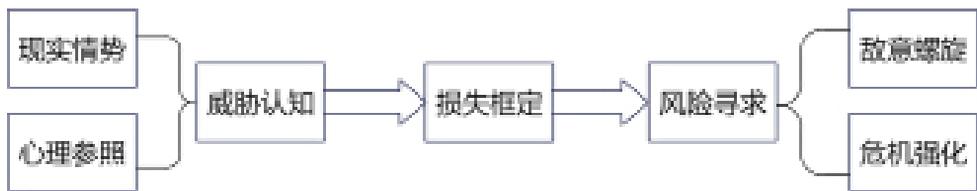


图1 霸权国风险寻求行为的内生逻辑

在三重威胁认知螺旋的作用下，威胁认知一旦达到“紧张点”，霸权国就会全力关注崛起国，并从非善意角度对崛起国的一举一动加以解读，从而形成杰维斯所称的“诱发定势”（evoked set），即在接收信息时，以其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1]同时，受“狭窄框架效应”^[2]影响，霸权国专注于应对所谓崛起国的挑战，从而忽视其他因素对霸权的影响。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在涉及崛起国的所有领域，霸权国都会有“草木皆兵”之感，同时会忽视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甚至将其其他因素曲解为“崛起国因素”，并据此进一步强化风险寻求政策。

从前述分析可知，霸权护持是霸权国的一项长期战略，在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冲击下，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将维持战略博弈态势。霸权国的风险寻求政策取向根源于其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和对自身损失的框定，必然催生三重威胁认知螺旋和危机的不断强化。鉴于其可能引发包括霸权战争在内的巨大风险，霸权国的风险寻求政策取向值得高度重视。

二、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变化与风险寻求政策取向

根据上述“威胁认知—损失框定—风险寻求”分析框架，霸权国在采取

[1]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前言”，第14页。

[2] 狭窄框架效应指的是孤立地考虑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对事情的影响，即没有大局观和整体观。参见龚超：《前景理论与决策那些事儿：一本正经的非理性》，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页。

霸权护持战略时存在风险寻求政策取向，且这一取向具有显而易见的内生动能，即霸权国基于零和博弈思维，认为在某个关键历史时期，崛起国的发展即意味着自己的损失。这种将自己置身于“损失域”的损失框定逻辑，不仅引发霸权国越发强烈的霸权焦虑，而且催生其通过风险寻求来实现霸权护持的非理性战略行为。当今世界，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中的非理性因素在对华政策中表露无疑。

（一）美国霸权护持心理参照点与对华政策演变

根据前述霸权国框定损失的心理参照点，我们可以绘制美国对华威胁认知的心理参照点（见表1），并结合美对华政策实践予以检验。

表1 美国霸权护持心理参照点

崛起国与霸权国 GDP 比率	中美 GDP 比率变化 关键年份	美国对华威胁认知 心理参照点	美对华霸权护持行为
30%	2008	警戒点	弱霸权护持
40%	2010	触发点	低烈度霸权护持
60%	2015	紧张点	高烈度霸权护持 I
70%	2020	关键点	高烈度霸权护持 II
100%	?	适应点	放弃霸权护持 ¹

1 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崛起国实力达到与霸权国相当的水平后，霸权国就无力阻止崛起国的崛起。同时，按照前景理论，霸权国经过长时间的霸权护持，在不能遏制崛起国的情况下，将逐渐调适自身心理，适应崛起国崛起的事实。对于中美双方来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不予论述。

1. 霸权护持警戒点与美对华战略警觉

冷战结束的1991年，中美两国的GDP分别为3833.7亿美元和6.16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6.22%。虽然美国社会存在一些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疑虑，但此时“弱小”的中国在美国眼中只是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的“异类”，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不构成现实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总量依然不大。中美之间虽经历诸多摩擦冲突，包括“银河号

事件”（1993年）、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台海危机（1995—1996年）、“炸馆事件”（1999年）等，但美国总体上维持对华“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及至世纪之交，鉴于中国的大国禀赋（特别是人口和领土规模）以及越发明显的大国潜力（经济高速发展），美国对华战略警觉意识上升。2006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第二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1]2008年，中国GDP达到美国的31.1%，超过30%这一威胁霸权的警戒线。同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重要作用，^[2]但中国拥有的经济实力也让美国更加担心。不过，美国战略界在这一时期尚未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决策层也只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是“潜在威胁”。^[3]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以及美国学者提出的“G2”概念，代表了当时美国一部分战略精英的看法。

2. 霸权护持触发点与美对华竞争式共处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达到美国的40.5%。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之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4]誓言“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5]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心的忧虑。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当时的中美关系尽管合作与竞争并存，但竞争，或曰合作式竞争已成为主要的一面。据此，中美关系可称为竞争式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February 6, 2006, p.2.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43, <https://history.defense.gov/Historical-Source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3] 2001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第一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eptember 30, 2001, p.4.

[4] “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5,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tate-union-address-prepared-delivery>.

[5]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7, 2010,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共处 (competitive coexistence)。^[1]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在此背景下推出的。

3. 霸权护持紧张点与美对华全方位遏制

2015年, 中国GDP达到美国的60.7%, 超过60%这一霸权护持的紧张点。正是在这一年, 美国国内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达到顶峰。^[2] 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很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对华接触战略失败”成为十分普遍的看法。^[3] 在此大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大国”(revisionist power), 全方位重构针对中国的威胁认知, 而且将此前主要聚焦于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中国威胁”叙事, 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领域, 对华实施全方位打压。^[4]

4. 霸权护持关键点与美对华“极限竞争”

2020年, 中国GDP达到美国的69.8%, 基本达到70%这一霸权护持的关键点。同年5月, 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再次无端指责中国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信息等手段“改变国际秩序”, 短期内“谋求印太地区霸权”, 长期意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公然宣称中国对美国的价值观构成挑战, 进而将美中对抗定调为“制度之争”与“价值观之争”。^[5] 拜登政府称中国是“唯一可能综合利用经济、外交、

[1]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pp.4-5.

[2] Mel Gurtov and Mark Seldon, “The Dangerous New US Consensus o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Vol.17, No.5, 2019. 对这场辩论的总结, 参见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19-28页;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2009—2018)》,《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39页。

[3] Harry Harding,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8, No.3, 2015, pp.95-112.

[4] 信强、陈宸:《“中国威胁新叙事”及对中美人文交流的影响——以特朗普时期为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24页。

[5]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20, pp.4-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军事和科技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1]拉开对华“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的序幕。^[2]中美关系可能失控的风险急剧上升。

（二）美国对华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内生动能

回顾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其对华威胁认知相继达到警戒点、触发点、紧张点、关键点后越发具有风险性的霸权护持战略因应，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其对华风险寻求取向的若干内生动能。

一是霸权固有的逻辑。霸权一旦生成，霸权护持便是它在整个周期最主要的国家利益。^[3]历史上，霸权国一般通过三种方式进行霸权护持：增强自身实力，保持对崛起国的相对优势，包括增加经济总量、科技创新、加强军事力量等，这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竞争战略；削弱崛起国实力，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全方位遏制和围堵，阻断崛起国的实力增长，这是“不让对手过得更好”的遏阻战略；发动霸权战争，在崛起国崛起过程中发起所谓“预防性战争”，将崛起国扼杀于真正威胁形成之前，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击杀战略。

尽管霸权战争是选项之一，但霸权国即便有能力用战争手段摧毁崛起国，也会极力避免与其发生全面战争，除非崛起国向霸权国主动发起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势必会大大削弱霸权国的权力，可能使其失去霸权地位，进而被第三国取而代之。^[4]国际关系理论界普遍认为，核武器的出现降低了核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使大国霸权战争变得不可想象。鉴于中国拥有核武器，同时具有超大规模、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美国几乎不可能通过发动霸权护持性质的预防性战争来“击杀”中国。在排除运用战争手段进行霸权护持的情

[1]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March 3, 2021, p.8,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2] Christopher Paul et al., *A Guide to Extrem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Rand Cooperation, 2021.

[3]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第256页。

[4] 同上，第178页。

况下，美国的战略手段只能是增强自身实力与削弱对手实力，即竞争战略和遏阻战略的双重运用。

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对华强硬的声音始终不断。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就反复重申，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中美两国终将发生冲突。^[1]2014年5月，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Martin Dempsey）也将中国列为美国应对的7个主要威胁之一。^[2]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战略视野重新投射到传统大国关系尤其是中国崛起问题；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把中国崛起视为美国在新的国际竞争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其政府高官和军方高层不断发出对华威胁性言论。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显露出一种霸权固有的逻辑与无奈，即一方面对华发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在内的各种威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表示要“管控对华竞争”，以免双边关系因紧张升级而陷入失控的危险。

二是敌意螺旋的反复作用。当前美国对华敌意的根源在于其霸权护持逻辑及错误战略认知，即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从根本上改变亚洲的势力均衡，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最终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3]并认定中国构成“全方位的威胁”，据此在话语叙事上将“长期来看”替换为“逐渐逼近”，鼓吹所谓“步步紧逼”的威胁。^[4]如拜登政府的对华认知就从“紧迫的挑战”（pacing

[1] 米尔斯海默在2014年再版《大国政治的悲剧》时，特意增加了“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一章来重申他的观点。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十章“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第390-425页。

[2] 邓普西将当时美国应对的主要威胁概括为“2-2-2-1”，即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朝鲜和伊朗两个中等国家、“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网络安全。参见“Transcript: Gen. Martin Dempsey at Disrupting Defense,” May 14, 2014,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gen-martin-dempsey-at-disrupting-defense>.

[3]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p.19.

[4] Kevin Rud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 Toward a New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Realism for a Common Purpose,” April 2015, https://asiasociety.org/files/USChina21_English_1509.pdf.

challenge) 上升为“紧迫的威胁”(pacing threats)。^[1] 基于错误的战略认知,美国内一些极端势力宣称,美国原有对华接触与融合政策正在为自己制造麻烦。^[2] “中国要取代美国”的认识也同样在美国智库中盛行。^[3]

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对华打压和恶意渲染下,美国民众对华态度显著恶化。2019年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美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人数几乎达到两国建交以来的最高点。^[4] 2021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5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者”,34%则认为中国是“敌人”。同时期,盖洛普公司的民调结果称,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比例从一年前的22%升至45%。^[5] 当前,从精英到普通民众,美国形成的全社会对华敌意,正在且仍将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上述敌意螺旋的形成,不仅毒化了美对华决策生态系统和舆论氛围,而且使比拼对华强硬成为美国所谓的“政治正确”,其危害性和危险性不言而喻。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曾严肃指出:“美国如果沿着零和博弈的思维处理中美关系,如果继续用‘政治正确’来误导对华政策,不仅解决不了

[1] Jim Garamone, “Austin Tells Reagan Forum How U.S. Will Take on Challenge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4,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861926/austin-tells-reagan-forum-how-us-will-take-on-challenge-of-china/>; Terri Moon Cronk, “DOD Official Outlines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in CNAS Forum,”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10,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869837/dod-official-outlines-2022-national-defense-strategy-in-cn-as-forum/>.

[2] Robert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2019, https://www.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CSR%2084_Blackwill_Trump.pdf;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2, 2018, pp.60-70; Zoe Leung and Michael Depp, “An American Consensus: Time to Confront China,” *Diplomat*, January 17,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1/an-american-consensus-time-to-confront-china/>; 李海东:《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33页。

[3] Fu Ying, “The U.S. and China Are Neither Allies Nor Enemies, but They Must Get Along,”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us-china-relationship_b_10439886.

[4] “China,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https://news.gallup.com/poll/1627/China.aspx>.

[5] 转引自赵明昊:《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3期,第32-33页。

自身的问题，还会使中美关系走向冲突对抗的终点。”^[1]

三是风险寻求与“护栏”管理的内在矛盾。如前所述，随着国际权力转移进程加速和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认为自己正处于不可容忍的“损失域”。鉴此，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不仅烈度越来越大，而且极具风险性。可以预见，美国这种风险寻求式霸权护持战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不会改变。霸权国在地位衰落过程中，其霸权主义甚至有可能更为嚣张。^[2]换言之，美国风险寻求式霸权护持战略有很强的内生动能。对此，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们有理由担心中美竞争的未来走势。支撑这种竞争的条件有助于强化竞争和对抗。”^[3]

面对中美关系的严峻局面，美国高官于2022年前后开始鼓吹为两国关系加固所谓“护栏”，以便为紧张态势不断抬升的中美关系注入某种稳定性，即希望稳定两国竞争。对此，王毅强调：“美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的问题上没完没了地挑衅，但又声称要保持关系稳定，避免冲突对抗，这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是矛盾的。”^[4]习近平主席曾指出：“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5]外交部发言人亦表示，中美关系的“护栏”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方应该做的是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和对中方作出的承诺。^[6]但显然，美国政府不仅存在对华认知错误，而且政策方向发生了明显偏离。

[1] 《王毅提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四大疑问》，外交部网站，2022年9月2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9/t20220923_10770698.shtml。

[2]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9页。

[3] Michael J. Mazarr and Samuel Charap, eds., *Stablizing Great-Power Rivalries, Rand Cooperation*, 2021, p.208.

[4] 《王毅提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四大疑问》，外交部网站，2022年9月23日。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网，2021年11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1-11/16/c_1128068890.htm。

[6] 《外交部：中美关系的“护栏”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新华网，2022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2-07/07/c_1128812937.htm。

三、美国对华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战略效应与风险

在霸权护持过程中，美国一方面受到国际权力转移加速这一现实情势的影响，一方面又深受自身霸权固有逻辑和战略焦虑心理的驱使，在对华政策上越来越倾向于以某种风险寻求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是塑造一种于己有利的战略竞争态势，在两国关系不至于彻底失控的情况下“慑服”中国。这种破坏性政策毫无疑问极具危险性，值得高度警惕。

（一）自损式极限“竞赢”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中长期扮演“世界警察”角色，肆意推行强权政治，自诩为所谓“世界领导者”。“对于美国民众来说……霸权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1]进入21世纪，尽管非西方国家的群体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美国民众并未做好自己国家不再是世界上最强之国的心理准备”。^[2]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直接催生美国的霸权焦虑。

随着中国GDP在2015年、2020年分别达到美国的60%和70%，美国将中国崛起框定为“美国受损、中国受益”的“损失域”，这是其霸权焦虑的内生逻辑。换言之，中美实力对比的相对变化，尤其是关于未来中国权力进一步增长的预判，引发了美国对霸权的“地位焦虑”，即中国有可能取代美国。^[3]在这种焦虑心理作用下，美国对华高烈度、高风险的霸权护持战略鲜明体现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践中。特朗普政府为达到霸权护持的目的，在打压中国方面宁可自损也在所不惜。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特朗普政

[1] Philip S. Golub, "The Sun Sets Early on the American Century,"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2007, <https://mondediplo.com/2007/10/04empire>.

[2] Kishore Mahbubani, *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 Public Affairs, 2013, p.159.

[3] 韦宗友：《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第51页。

府对华政策，并在反思特朗普做法的基础上，抛弃特朗普政府“毕其功于一役”不切实际的想法和简单粗暴的做法，强调对华竞争的长期博弈性，^[1] 公开鼓吹“极限”性质的“竞而赢之”。

（二）选择性修正主义胁迫

传统上，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霸权国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致力于捍卫现有的国际秩序，因为它从这种秩序中获益最多。相反，一个崛起的大国通常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国家，因为它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规范。^[2] 二战结束后，美国着眼于战后世界秩序安排和自身霸权地位的巩固，在对苏联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实施遏制战略的同时，着手构建了一系列符合其战略愿景、价值追求和利益拓展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3] 并以此作为最大的“公共产品”利诱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通过树立“现行秩序维护者”的身份来赢得追随。但是，随着美国霸权护持过程中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加剧，越来越多研究开始质疑这一传统思维定式，强调实力强并不必然意味着满足现状，获益多也并不意味着不会试图修正秩序。^[4]

实际上，出于攫取利益、及时止损、防患于未然的考虑，霸权国可能产生改变现状和修正制度的强烈意图并采取行动，^[5] 这在当今美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美国学者指出：“近年来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

[1] Ryan Hass, “Biden Builds Bridges to Contend with Beijing,”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January-March 2021; J. Brian Atwood,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Play the Long Game with China,” October 29, 2021,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79091-tone-down-the-rhetoric-and-play-the-long-game-with-china/>; David Brunnstrom and Humeyra Pamuk, “U.S. Secretary of State Nominee Blinken Sees Strong Foundation for Bipartisan China Policy,”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biden-state-chinaidUSKBN29O2GB>.

[2] Steve Chan, Weixing Hu and Kai He, “Discerning States,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Orientations: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U.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7, No.2, 2018, p.2.

[3]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Alexander Cooley, Daniel Nexon and Steven Ward,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5, No.4, 2019, pp. 689-708.

[5] Steve Chan, Weixing Hu and Kai He, “Discerning States,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Orientations: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U.S.,” pp.613-640. 转引自陈拯：《霸权国修正国际制度的策略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3期，第40页。

困境，其自身也越来越成为多边国际机制的颠覆和破坏力量之一。”^[1]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不断“退群”“毁约”，就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表现。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特朗普激进的“修正主义”政策进行了刹车，但仍表现出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一是撇开已有国际机制，搭建新机制和平台，组建“小圈子”，以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尤其是“竞赢”中国这一首要目标。二是继续施压相关国际组织，要求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进行改变。如拜登政府首份国家安全备忘录就要求国务卿和卫生部长就“加强和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向总统提出建议。^[2]

（三）阵营化盟伴网络围堵

作为霸权护持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重构盟伴关系网络成为美国遏阻中国崛起的重要抓手。伴随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行，于2007年形成、2008年搁浅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于2018年迅速重启并提速，成为美国在大国战略竞争新形势下着力打造的核心多边联盟。拜登政府上台后也明确表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首要载体，将在该机制框架下开展多维度、全方位合作。^[3] 在重视“四国机制”的同时，美国也在双边同盟基础上大力推进三边合作，力图打造三边盟伴体系，主要包括美日韩、美日印、美日澳、美澳印、美英澳、日澳印等三边网络。美国还力促北约与美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深化合作，推动北约加大介入亚太事务，

[1] David A. Lake, Lisa L. Martin and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Special Issue 2, Spring 2021, pp.225-257.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on United States Global Leadership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VID-19 Response and to Advanc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Biological Preparedness,” January 2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1/national-security-directive-united-states-global-leadership-to-strengthen-the-international-covid-19-response-and-to-advance-global-health-security-and-biological-preparedness/>.

[3] “Biden Administration Sees Quad as Fundamental Foundation to Build US Policy on Indo-Pacific,” January 30, 2021,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news/world/biden-administration-sees-quad-as-fundamental-foundation-to-build-us-policy-on-indo-pacific/article33702527.ece>; Jim Garamone, “DOD Working Toward Networked Indo-Pacific,” August 31, 202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2330412/dod-working-toward-networked-indo-pacific/>.

企图调动西方集体力量共同遏制中国。

这种从双边“轴辐式”（hub and spokes）同盟向多边网络化体系发展趋向，是美国在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后，为应对所谓“中国挑战”所做的战略选择，也是霸权护持战略中风险寻求政策取向使然。美国构建多层次盟伴网络，不仅有传统的地缘和军事考量，还旨在打造围堵、遏制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联合阵线甚至同盟体系，从而实现联盟功能的叠加。拜登政府尤其倾向于建立多层次、针对性、灵活性的盟伴体系，推进“阵营驱动的竞争”（coalition-driven competition）^[1]，以形成对华竞争优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库珀（Zack Cooper）等人提出，美国需要建立四种针对性联盟，即地缘战略联盟，反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所谓“霸权”；经济联盟，反对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技术联盟，阻止中国获得 21 世纪的创新技术；治理联盟，阻止中国“重写”国际规则规范。^[2]

（四）代理人式消耗战

在大国战争难以想象的情势下，采用间接路线，即借助他者打败共同敌人，是霸权国的又一策略选择。作为代理人的国家或地区，若与美国的竞争对手之间存在现实权益纠纷、历史宿怨，或对其存有“霸权恐惧”，无论是三者居其一还是兼而有之，对美国都是某种“机遇”。美国所需做的便是打入楔子，同时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意识形态上施以适当援助和诱导，来增强代理人对抗中国的实力、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美国在朝鲜半岛、台海、南海、中印之间四处拱火，乐见甚至挑起印度、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与中国的竞争、摩擦甚至冲突，还通过打“台湾牌”推高台海紧张关系。此类代理人式消耗战旨在削弱中国实力，“推回”中国的国际影响，一定程度上确实牵制、消耗了中国的战略资源。这种假借代理人实施的风险寻求策略，尽管具有高度危险性、后果不可控性，甚至可能将自己逼入进退失据的战略窘境，但在美国看来，相较于与中国的直接军

[1] 赵明昊：《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第 21 页。

[2] 同上。

事碰撞，仍不失为一种“次优”战略选择。

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中的对华风险寻求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也使美国自身深受其害。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中的非理性因素若进一步增长，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也存在难解悖论：既要遏制中国权力的增长，又想在对自己有利的领域与中国合作；既不愿与中国进行战略摊牌，又想通过风险寻求政策“慑服”中国。可见，美国政府对华风险寻求政策取向是一把双刃剑，其战略效应损人不利己。

四、结语

前景理论表明，面临收益，人们很容易调高其心理参照点（预期水平），但在面临损失时却很难下调心理参照点。据此可以合理推断，决策者坚持特定预期水平的的时间越长，他们在纾解损失（调低心理参照点）方面的困难就越大。^[1] 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心理参照点体现为决策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愿望或政策目标上，以此作为衡量相对得失的标准。^[2] 在霸权护持心理作用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先后经历霸权护持警戒点、触发点、紧张点和关键点。特别是进入紧张点和关键点后，美国对华认知因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日益负面，错误将现状设想为“美国受损、中国受益”，为此动员全政府全社会资源，采取各种手段对华全方位遏制打压，甚至实施激烈又冒险的霸权护持战略。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清醒，正确认识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中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内生动能，知晓其战略心理、战略目的与战略设计，明了其战略手段的危险性。基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在认真应对美国遏制、围堵、打压的过程中，直面其凶险也知晓其限度，据此综合施策。

首先，鉴于美国对华威胁认知螺旋对其风险寻求政策取向的巨大推动作

[1] Jeffrey W. Taliaferro, "Power Politics and the Balance of Risk: Hypotheses on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p.199.

[2] *Ibid.*, pp.200-201.

用，中美高层在当前尤需保持战略沟通。这不仅有助于双方阐明各自战略意图，而且有助于增强对彼此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的相互理解。2025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指出，“我们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都希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新任期有一个好的开始，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后者亦表示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1]

其次，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华遏制打压，实则是基于自身经验的错误判断，将“国强必霸”的理论逻辑应用于中国。这方面，“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释路径最具典型性，它将西方历史上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的经验，套用于现阶段的中美关系。鉴此，中国需要努力构建自主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尤其就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这一重大课题展开系统研究，努力消减西方理论的错导，帮助国际社会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再次，随着国际权力转移的加速，美国内舆论对中国的发展和对外政策存在不少误解误读，甚至刻意污名化。为正本清源，中国需要大力创新契合信息时代心理特质的国际传播模态，重点打造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社会话语相结合的话语体系，将自身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全面真实地展示给世界，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

化解外部遏制打压的根本之途最终在于自身实力的增强，核心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高科技的自立自强以及创新创造能力的显著进步。同时，中国应基于“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等政策工具，坚定不移地通过战略制衡慑止美国的政策冒险，通过战略沟通改变美国的错误认知，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责任编辑：吴劲杰】

[1] 《习近平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5年1月17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501/t20250117_11538132.shtml。